

世界史研究

RESEARCHES IN WORLD HISTORY (第三辑)

徐 蓝◎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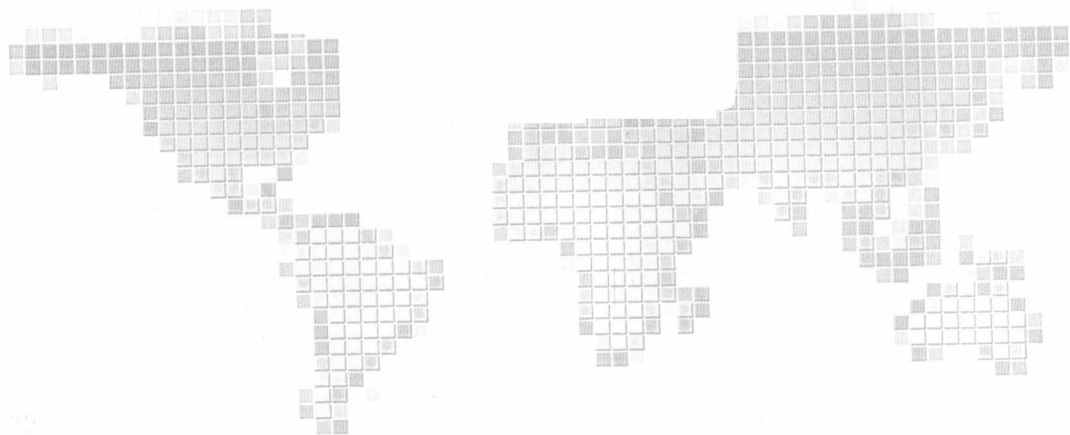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世界史研究

RESEARCHES IN WORLD HISTORY (第三辑)

徐 蓝◎主编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鲁 静
责任编辑:李椒元
版式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研究. 第三辑/徐蓝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
ISBN 978-7-01-008554-8

I. 世… II. 徐… III. 世界史-文集 IV. 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684 号

世界史研究

SHIJIESHI YANJIU

第三辑

徐 蓝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200 千字 印张:17.25

ISBN 978-7-01-008554-8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代序:回首 30 年世界史学科蓬勃发展 展望未来需再接再厉任重道远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①

徐 蓝

1978 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使国家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从此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就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来说,30 年来,它从最初的一个地方院校的小学科发展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的正确与辉煌。

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始建于 1954 年,主要奠基人是齐世荣、戚国淦、田农、傅任敢、邵鼎勋等先生。他们以其深厚的中西学问的修养和炽热的爱国之情,成为这一学科的第一代学人。在他们的培养带动下,以陈曦文等教师为代表,成为这一学科的第二代学人。从 1954 年到 1976 年,他们在世界史领域拓荒耕耘,开设了各门断代史课程,参与编写了教育部委托的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参与了教育部主持的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 4 卷本《世界通史》及其资料集的编写工作,并翻译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等世界名著,从而建立了一支在国内比较有成就的世界史教学队伍。但是受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相对封闭的政策限制,特别是

① 本文写于 2008 年 3 月,是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校报《首都师大》征集的“我看改革开放 30 年”所写的征文,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刊登在《首都师大》2008 年 4 月 3 日第二版上。这本论文集的编辑正值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故以此文代序。

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发展世界史学科所必需的人才、图书资料以及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等等条件基本都不具备,也没有形成本学科独特的学术特色。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7年冬季,在中断高考11年之后,我和我的同学们从田间、山野、工厂、课堂走进高考考场。这突如其来的令人措手不及却又令人欢呼雀跃的高考热潮,成为全党全国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最早一声春雷。当我们经历了不同的曲折而终于成为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77级的学生时,对邓小平的感恩之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1978年底,传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要求“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求“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文字既引人注目又发人深省,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再一次“开眼看世界”,而我们许多同学所喜欢学习的世界史也将大有用武之地。

1978年,国家恢复了硕士研究生的招生,1979年世界史学科就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1年国家又恢复了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而我们世界史学科作为全国第二批博士点,于1984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20世纪80—90年代,我们77级的一些同学在世界史学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人的指导下,在这里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从而成为本学科的第三代学人。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恢复了高考和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学位制度,为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的稳步发展,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经济投入不断增加。这里仅举两个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有比较密切关系的例子说明。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及其研究项目的资助。1982年,国家就正式启动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从制定“六五”规划开始,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给以一定的资助,教育部也制定了同样的规划;1983年北京市即开始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六五”规划并给以资助,以后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北京市人事局、教委等各机构都有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和科学研究项目。至今为止,世界史学科共获得17项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以及教育部和北京市的上百个项目的资助,这些资助金额已经超过140万元。

第二,重点学科和创新团队的评选和资助。1986年教育部和北京市相继启动了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1987年世界史学科便被评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建设学科。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用北京市资助的经费购买了第一台复印机,使我们能够复印大量英文书籍,我们还复制了英国30年代的内阁会议记录和备忘录的缩微胶卷,以弥补当时所需各种外文图书资料的不足;90年代初,我们又用北京市资助的经费开始购买国外最新出版的大型英国外交文件集《英国外交事务文件: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机密报告和文件》,一下子就买了90卷,是当时国内唯一购买这种资料的学校。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财力的进一步提升,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资助力度也不断加大。2002年世界史学科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得到了北京市财政的连续6年的经费资助,再加上北京市211经费的投入和学校的其他投入,资助金额达620余万元。2005年,世界史学科被评为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世界史学术创新团队,其中1人被评为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至今为止共获得经费资助150万元。

30年来,世界史学科仅就上述所提到的经费资助就获得910余万元,平均每年30余万元。这些经费为世界史学科的各方面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最突出的有5个方面。

首先,使本学科的成员能够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优势,明显增强了开展学术前沿问题的研究能力,形成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宏观世界史等三个有特色的国内领先、国际上也有有一定知名度的研究方向,并初步形成了古典希腊罗马史研究方向,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撷英集:英国都铎史研究》、《英国16世纪经济改革与政策研究》、《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研究》、《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技术》、《西欧中世纪社会史研究》、《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绥靖政策研究》、《20世纪的历史巨变》、《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新外交·旧世界——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史》(全6卷)、《世界史》(全4卷)、《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3册)、《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3册)、《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畜牧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荷马社会研究》,等等。这些成果,共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首届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青年奖1项,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全国优秀图书奖2项,北京市优秀图书奖1项。另外,世界史学科的成员在教学方面也积极投入,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1项合作),国家级教学团队1项,国家级精品课程1项,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青年教师奖1项,北京市教学名师奖1项。这些成就,为世界

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由于有了经费的支持,世界史学科开展了相当活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这是30年来变化最大和发展最显著的领域,对世界史学科来说,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主要是“送出去”,那么后10年就是“送出去”与“请进来”并进。就“送出去”来说,我们的第一代学人和第二代学人只有少数人得到过1次出国出境进修访学的机会,但是第三代学人则每个人都得到过至少1次以上出国出境机会,不少人还得到过2次以上的出国出境进修、访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供学术讲座等的机会,而我们的第四代学人也已经有不少人不止1次的出国。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至少有36人次出国出境进行各种学术交流,而其中的20多人次是在2001—2006年进行的。就“请进来”来说,变化更大。我还清楚地记得,80年代初校园里除了一些教外语的外籍教师之外,很少看到其他专业的外国专家的身影。当时齐世荣先生邀请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乔治·伊格尔斯夫妇讲学,不仅成了全系甚至是学校的一件大事,而且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讲座开始那天,许多外校学生早早就来到教室占领座位。2007年,当我们再次在首都师范大学见到这对已经80多岁高龄的老夫妇时,他们还指着当年留下的珍贵照片,说到了当时的学生和老师们挤满教室听课的情景。和那时相比,2005年,本学科召开了1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俄国、法国等11位国外专家与会;仅2007年一年,我们就邀请了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的学者8人来历史学院讲学,其中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教授是我们从2006年聘请的特聘教授,每年来讲学;我们还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初步的学术交流关系。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我们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仅2005—2007年我们就邀请了40多位国内著名专家来讲学,我们设立的“博导论坛”已经成为首都师范

大学世界史学科的重要品牌。这些学术交流,对提高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并能够与国际接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科研条件不断改善。其一,图书资料大幅度增加,有了世界史学科自己的图书资料中心。刚刚改革开放时,本学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人就建立了英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资料室,但仅有中外文藏书千余册,且多以论著为主,缺乏第一手的原始资料集。但是,通过近30年的再积累,2005年,我们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史资料中心,到2007年该中心已经收藏中外文图书1.6万余册,其中外文图书8000余册。包括许多重要的原始档案资料集,如《英国外交事务文件: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机密报告和文件》(600余卷)、《杜鲁门总统文件》(35卷)、《罗斯福总统文件》(25卷)、《洛伊布丛书》(495册)、《威尔逊文件》(69卷)、《美国外交文件》(250余卷)、有关英国内阁档案和外交部档案的缩微胶卷百余卷;以及有关中世纪史、英国都铎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通史、全球史等方面的图书。其二,为每位学科成员配备了数码设备,为专家设立了6个专家工作室,建设了1个学术报告厅,使他们都能通过互联网获得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这些硬件条件的改善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本学科成员的教学与科研的积极性,也提升了教学与科研的总体水平。

第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在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参考、宣传党的外交政策、普及世界历史知识、为经济建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本学科成员曾多次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授课并撰写文章;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学术团体的活动,为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咨询服务;通过学术研究,如对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的研究,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通过参加国家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研讨、制定、项目评审、成果评奖等工作,为繁

荣社会主义文化服务;通过为本校和其他高校学生宣讲有关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的党课,为宣传党的对外政策服务;通过参加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世纪战争》、《世界历史》等电视资料片的撰稿和拍摄;积极普及世界历史知识;通过主持和参加《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修订,以及教育部高中示范教材《世界历史》的编写等工作,为国家的公民教育服务;通过坚持每年为北京中学教师硕士课程班授课,多次为北京中学教师作“学术前沿”讲座,参与中学教材的写作和咨询,为北京市和全国的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服务。

第五,学术队伍得到稳步加强,人才培养取得可喜成绩。30年来,世界史学科的学术队伍健康发展,第三代和第四代学人已经继承了前两代学人的优秀学术传统,成为支撑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本学科有教学研究人员17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2人,具有博士学位者12人。我们还通过引进人才,进一步充实了学术队伍。这支拥有较强实力、年龄结构基本合理、具有高职称、高学历和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队伍,成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不仅如此,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知识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世界史学科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于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以本学科为支撑,我们从2000年设立了北京市级品牌建设专业——世界历史专业,进一步提高了本学科的人才培养能力,并形成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多层次培养体系。30年来,我们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树立全方位的科学培养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注重提高学生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把握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坚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学术规范教育;训练正确的

研究方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型国家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管理、教学、科研及其他行业的高级人才。

30年时光荏苒,30年沧海桑田。我们这一代人不仅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和个人命运的根本转折,而且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亲身参与了这一新时期的伟大历史进程。从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中,我们见证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总结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的正确性,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无限生命力。

回首已经走过的30年,我们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展望未来的发展道路,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继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努力进行文化创造,通过继续推动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通过继续发挥世界史的社会文化建设功能和思想库作用,努力解放思想,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目 录

(Contents)

代序:回首 30 年世界史学科蓬勃发展 展望未来

需再接再厉任重道远 徐蓝(1)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晏绍祥(1)

Orators and Politics in Greek Polis

Yan Shaoxiang

《神学大全》中对女性形象的神学建构 刘文明(41)

The Th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Women's Image in The Summa

Theologica

Liu Wenming

析“乡绅入侵”——对英国都铎王朝议会选举中“异常

现象”的解读 刘新成(52)

“Gentry Invasion”:An Abnormal Phenomenon in Parliamentary E-

lections in Tudor England

Liu Xincheng

中世纪英国的军事强买权 施诚(79)

Military Purveyance in Medieval England

Shi Cheng

马克斯·韦伯与 20 世纪清教史学 刘城(101)

Max Weber and the Research on Puritanism in 20th Century

Liu Cheng

美国西部牧区的掠夺开发及后果	周钢(109)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American West Range and Its Consequences	Zhou Gang
试析 1918—1920 年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兼论 《色佛尔条约》的艰难出台	赵军秀(126)
The analysis of British Policy on Turkey in 1918—1920	Zhao Junxiu
1935 年萨尔全民公决与英国外交	梁占军(148)
The Saar Plebiscite of 1935 and the British Diplomacy	Liang Zhanjun
美国对德国 1935 年重整军备的反应	程文进(162)
American Reaction to Germany's Rearmament in 1935	Cheng wenjin
从昭和研究会看战争中的日本知识分子	史桂芳(173)
On the Necessity of Writing a Concise World History	Shi Guifang
艾森豪威尔政府援助法国发展核潜艇问题之研究	姚百慧(186)
The Study of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Aid to France in its Development of Nuclear Submarines	Yao Baihui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保护	徐蓝(200)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Safeguard the State Sovereignty	Xu Lan
文明交流的限制	王燕平(218)
The Limit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s	Wang Yanping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历史研究若干新视角	何平(226)
New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Studies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He Ping
中国高等学校世界通史教学状况调查报告	夏继果(246)
Teaching World History at Chinese Universities: A Survey	Xia Jiguo
编写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是时代的需要	齐世荣(256)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晏绍祥

引言

1962年,芬利发表他关于雅典民主的经典论文《雅典人民领袖》,强调雅典政治家特征上的一致性,认为从城邦形成到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领袖之间,并无本质区别。^①1971年,康纳出版其著名的著作《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型政治家》,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芬利相反,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随着雅典政治的变革,政治领袖的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家从原来主要依靠朋友和亲属,转向主要依靠说服人民,形成康纳所说的“新式民主”和“新型政治家”,并且有意无意地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与新式民主的特征联系起来。在康纳看来,新式民主的重要特征,就是演说家成为政治家。一些年轻人甚至在没有任何军功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具有演说能力,就取得了重大政治影响。^②两人都是西方古典学界重量级的学者,其论

① 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in M. I. Finley (ed.), *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74, pp. 1-18. 哈丁的看法与芬利相近,他特别指出,在雅典,“虽然可以肯定,只有少数演员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但绝大多数政治家必须是好的演员,他们必须选择一种角色,创造一种形象。”并认为雅典演说家为诋毁对手而散布的假话、谎话,也是其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有力地支持了芬利的看法。见 P. Harding, *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Phoenix, vol. 41 (1987), p. 36.

② W. Robert Connor, *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p. 134-136.

点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芬利的论文除收入他主编的《古代社会研究》外,还出现在他的名作《古代与近现代民主》的增订版中,^①并出现在几乎所有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著作的参考文献中。而康纳的著作,在1971年初次出版后似乎就产生了重大影响,1992年又由哈克特公司出版,多次重印,反映了它受欢迎的程度。中国学者的观点更接近康纳,更具有批判意味。不少学者承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以降,雅典人民不再尊重法律,只听那些煽动家的蛊惑,导致政治混乱,朝令夕改。^②“民主派的首领堕化为 demurgogue(煽动家、蛊惑者)。他们讨好群众,愚弄群众,将公民大会变成他们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③如果说“‘人民领袖’还多少代表了雅典公民大多数人(山地派、海岸派)的利益,那么‘蛊惑家’就逐渐失去了任何社会基础,而是利用公民的多数,钻营自己的私利了。……公民大会成了城市无产公民高谈阔论的场所,甚至连陪审法庭,由于经济的原因,只有老弱病残或者不务正业的人才去任职了”。^④最近出版的一本专门讨论希腊政体和官制的书在谈到公民大会的局限性时,也提到了煽动家

① M.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 此点承黄洋教授指出,特此致谢。

②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所说的最后一种民主政体,可能就是伯里克利以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亚里士多德笔下,这种政体完全抛弃法制,以群众的决议取代法律的权威,而群众又受到平民领袖的左右,根本不能算是一种政体。近代学者虽努力为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正名,但他们或者如琼斯那样强调此后民主政治的温和性和中产阶级特征;或者如奥斯瓦尔德和汉森那样,强调法律的权威。但他们大多仍承认,伯里克利以后的民主政治,是某种程度的激进民主。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30页;Charles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Century B.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A. H. M. Jones,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M.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③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④ 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问题,“在雅典民主的历史上,由于身为富人的领袖人物的煽动,经常出现公民大会通过错误决议的事。”“由于蛊惑人民的政客的煽动,公民大会走向极端。”接着作者援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段论述作为证据。^①在他们的笔下,煽动家的出现,既是城邦衰落的原因,也是城邦危机的表征。这些学者心目中的煽动家,显然就是克列昂、许佩波罗斯、安提奥丰等民主派演说家,似乎正是这些演说家的蛊惑,才导致了雅典政治的败坏,以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最后失败。公元前5世纪末演说术在雅典的兴起,正好与民主政治趋向“极端”、政策上出现失误在时间上吻合,似乎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那么,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雅典是否有演说家?如果有,他们和那些“新型政治家”之间有区别吗?更重要的是,其他希腊城邦的政治家是演说家吗?如果是,城邦政治为什么会产生演说家?

演说家不仅仅是所谓极端民主的产物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演说家显然不仅仅是所谓极端民主的产物。从辞源学角度看,希腊语中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是同一个词。演说家一词首见于《伊利亚特》,写作 $\rho\eta\tau\eta\rho$,指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的人,但含义不特别明显。^②后来成为公共演说家的 $\rho\eta\tau\omega\rho$,以及与此有关的术语如演说术等,可能迟至公元前5世纪中才在雅典产生,指那些政治上活跃、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人,修昔底德、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等可能是第一批使用这些术语的人。后来,因为雅典的政治家同时必然是演说家,该词具有政治家的含义,甚至成为政治

① 杜平:《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60页。

② Homer, *The Iliad*, IX, 443,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家的同义词。^① 最早把政治家和演说家联系起来的,可能是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人讨论西西里远征时,修昔底德批评了雅典人对该岛的无知和演说家的煽动,以及鼓吹该政策的人所隐藏的私人动机。当远征失败的消息被证实后,雅典人民“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好像他们自己没有表决赞成似的”。^② 在评价伯里克利时,修昔底德更明确地谈到,伯里克利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贤明和廉洁,更在于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但是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领导权。……由于他们的不和,开始使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③修昔底德笔下忙于内部斗争和个人阴谋的领袖,显然就是那些演说家。对修昔底德来说,伯里克利之前的政治家同样可能是演说家,而伯里克利之后的演说家所以应受到谴责,不是因为他们是演说家,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平等的,只知道讨好人民,追求私利,也就是说,是道德品质有问题的演说家。易言之,修昔底德并不否认伯里克利本人和他之前的政治家是演说家。与修昔底德大体同时的苏格拉底认为,作为一个将军,“除了具备其他资格之外,必须还是一个会演说的人”。“我们所借以认识生活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语言学来的;我们所学得的其他一些有用的知识也都是通过语言学得的;最好的教师是最会运用语言的人;懂得最重要道理的人都是最会讲话

① Liddell, Scott &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p. 1570; 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5.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出版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第 771 页关于 $\rho\eta\tau\omega\rho$ 的第一个释义是:“演说家,〔雅典〕(尤指)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政治家”,充分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567 页。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50—151 页。